外国文学研究60年

主持人语

外国文学研究是我国学术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与社会语境、学术氛围和研究水平等诸多因素相关。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与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了各种互动，积累了很多经验。若加以认真总结，可为今后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为今后的文化建设提供重要借鉴。本专栏推出的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09&ZD071)的部分阶段性成果。以往对外国文学研究加以历史考察的项目一般根据国别和作家展开，注重的是资料性。为了推动外国文学学术史建设向纵深发展，本重大项目分不同类别(作品研究、文论研究、文学流派研究等)和不同专题对外国文学研究史展开探讨，做到既资料丰富，又有较为深入的分析判断，并注重跟国外同期研究的横向比较。本专栏推出的四篇论文均为作品研究中的专题。文学作品有小说、诗歌、戏剧这三大类，而小说研究论著在数量上又大大超出诗歌研究和戏剧研究论著，值得予以更多的关注。本专栏的论文分别聚焦于新中国的莫里哀戏剧研究、高尔基小说研究、普鲁斯特小说研究和华兹华斯诗歌研究。作者既有资深学者又有中青年才俊。他们在简要总结建国前研究状况的基础上，沿着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分期，从不同角度系统深入地探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相关研究的特征、方法、热点和争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对研究的下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申 丹

新中国莫里哀戏剧研究60年

陈 惇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在中国，莫里哀是最早被引进和最受欢迎的西方古典戏剧家之一，但是真正形成对他的研究高潮还是在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年代。此前的研究多半是以历史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着重研究莫里哀作品的社会历史价值，强调其战斗性。1978年以来，中国的莫里哀研究不仅成果超前，而且逐步深入，论者对有关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莫里哀是反封建的战士还是表现路易十四时代主流意识的戏剧家？莫里哀是古典主义作家还是现实主义作家？如何看待莫里哀喜剧中的悲剧因素？如何认识莫里哀作品中的所谓“扁形人物”？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但是研究方法单一，研究力度不够，研究对象过于集中，以至少有突破性的成果。近年来出现研究方法多元化的趋势，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莫里哀；戏剧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I 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2)03-0073-09

收稿日期：2012-03-02

作者简介：陈惇，男，浙江湖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大学文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09&ZD071)

欧洲近代讽刺喜剧的奠基人、法国戏剧家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①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自从 20 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之后,一直受到中国戏剧界和文学界的关注,而且进入高等学校教材,因此,除了在特殊时期之外,有关的评介持续不断。如果说,在"文革"之前,有关的评论并不太多,而且一般采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注重研究其作品对现实的批判意义,那么,"文革"之后,莫里哀研究出现空前兴旺的状态,而且显露出多元化和全面评价的趋势。

一、新中国成立前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一批外国戏剧家被介绍到中国。莫里哀是其中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外国戏剧家之一。20 世纪初期,报刊上就出现了介绍莫里哀的生平和创作的文章,有的译本在正文前后附有介绍这位作家的文章。到了 30 年代,有全面评介莫里哀的传记(杨润余的《莫里哀》)出版,还有多种法国文学史设有莫里哀专节。1935 年,国立编译局出版了王了一翻译的、包括作家的几个早期作品的《莫里哀全集》第 1 卷,前面附有格里马雷撰写的长文《莫里哀传》。

当时评论界一致认为,莫里哀是近代喜剧的始祖、法国古典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有的论者还把他与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一起,并称为欧洲戏剧史上的三大作家。此外,那时的论著比较看重莫里哀对 17 世纪法国现实的描写以及他的剧作所具有的那种关注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喜中含悲的特征。如焦菊隐的《论莫里哀》就指出:莫里哀喜剧的特点,就是在剧本的内涵中,充满了"哀"的元素,他真实地描写人生,"虽是件悲剧,在观众也会发笑的……笑完之后,还要使你往深处去推想……经过深思之后,会生出无限的悲哀,这是莫里哀戏剧真正的效用"②。

初步的比较研究,也是当时莫里哀评介的一个亮点。论者把莫里哀与英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的李渔进行比较研究,得出有意义的结论。李健吾把莫里哀的《吝啬鬼》连同欧洲戏剧史上其他塑造吝啬鬼形象的作品一起,与中国戏剧中塑造吝啬鬼形象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中国戏剧在这方面虽有精彩的片断而未能写出震撼人心的形象的原因,文章不长,却切中肯綮。③

当然,这一时期的莫里哀研究还处在起步的阶段,除了焦菊隐、李健吾的文章较有深度外,一般都是借鉴西方学者的观点对作家进行评介,创意较少,论述不深。即使如此,在对作家的理解和作品的取舍上,中国的评论界也表现出自己的特点。

二、1949 年至 1978 年

随着新中国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外国经典作家成为当时评论界关注的热点之一。50 年代末,中国出现了一个莫里哀热。戏剧舞台上演出了他的《伪君子》和《悭吝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先行出版的单行本的基础上,出版了赵少侯等翻译的三卷集《莫里哀喜剧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李健吾翻译的《莫里哀喜剧六种》。配合着舞台演出和文集出版,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评论文章,以帮助观众更好地欣赏世界名著。

在评论方面,上面提到的两部莫里哀作品选,书前都附有长篇的序言,实际是论文,而且也是当时全面评介莫里哀的重要论文。报刊上发表的论文不多,如黄式宪的《答丢夫的不朽意义》、林湮的《论莫里哀喜剧的结构》。196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唐枢撰写的《外国历史小丛:莫里哀》。那时出版的几本外国文学教材,如石璞的《欧美文学史》、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都把莫里哀作为重点作家来评介,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普遍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翻译出版了两本苏联学者莫库尔斯基撰写的莫里哀论著(新文艺出版社 1957 年出版的《莫里哀》和作家出版社 1957 年

① 莫里哀有多种中文译名,如莫利哀、穆理哀、毛里哀、莫利耶等,现采用《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译名"莫里哀",但为了读者查找方便,本文在提到已发表的文章时,仍然保留原文题目和行文中的译法而不加改变。出于同样的考虑,对于本文提到的莫里哀作品中文译本的不同译名,本文也采取以上的处理方法。

② 该文原是为作者所译的《伪君子》而写的序言,后来发表在 1928 年 4 月 16 日《晨报》副刊第 79 期。

③ 李健吾:《李健吾戏剧评论选》,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1—14 页。

出版的《论莫里哀的喜剧》)。莫库尔斯基运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以现实主义和人民性作为基本标准,着重研究莫里哀如何反映了 17 世纪法国社会,如何从人道主义出发,以讽刺为武器,抨击了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种种弊端。他的论著在那个全面学习苏联的特殊时期传到中国,对我国的莫里哀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一些基本论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在五六十年代,为我国学者所接受。另外,当时翻译出版的苏联学者穆拉维耶娃等著《西欧文学简论》中的论莫里哀一章,也对中国学者产生影响。

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中,李健吾的论文《莫里哀的喜剧》和吴达元为《莫里哀喜剧选》所写的序,是最重要、最有分量的两篇。

作为文学家、翻译家和戏剧家的李健吾,很早就关心莫里哀,进入 50 年代,他以更大的精力从事莫里哀作品的翻译和研究,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负盛名的莫里哀研究专家。李健吾发表在《文学研究集刊》第 3 册上的长篇论文《莫里哀的喜剧》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第一篇有关莫里哀的论文。文章认为,莫里哀"像阿里斯托芬那样泼辣,像米南德那样深入世态,专心致志,写出各类喜剧,成为现代喜剧的前驱"。"他继承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发扬法兰西中世纪以来就有的几乎总是带着政治性的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表现出了热爱生活乐趣和自由批评权利的愉快、活泼、勇敢与机智的进攻精神"。文章的主要部分是莫里哀作品分析。文章的分析方法很独特:不是一个个地解析作品,而是从 17 世纪法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出发,分别从宗教、贵族、资产阶级、年轻人和下等人四个方面,综合性地分析"莫里哀的主要作品和主要人物的社会根源和社会意义"。这篇文章提供了大量有关莫里哀喜剧创作的背景史料,对读者了解作品的内容和人物以及莫里哀的历史地位,都是不可或缺的。结合社会分析和丰富的史料综合性地剖析作品思想和人物,成为这篇论文的一大特色。文章最后两段以"纲纪与法则"、"喜剧艺术"为题,分析莫里哀与当时文艺思想主潮——古典主义的关系和莫里哀喜剧的艺术特色。李健吾认为,莫里哀重返巴黎后,"接受当时的风气,然而并不屈服。他始终尽可能保持他的独立见解"。谈到莫里哀喜剧的特点,李健吾把它概括为三点:发挥主题,逗观众笑,同时说明性格。然而,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点:"莫里哀把刻画人物性格看成他的首要艺术工作","他的造诣最高的喜剧,其所以格调高于一般喜剧,未尝不是由于他在这方面下了极深的工力的缘故"。文章最后特别强调"莫里哀的创作原则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创作原则",同时,对莫里哀喜剧人物性格的单一和剧中的悲剧性提出自己的解释。李健吾认为,作为一个喜剧作家,莫里哀更懂得如何把握好喜剧的特殊性,必须让人物在真实的基础上变成"滑稽人";"悲剧材料,在他的处理下,会有意想不到的喜剧妙趣……往往在使人哄堂大笑之后,引起一种悲剧感觉"。① 李健吾的这篇论文影响极大,后来的莫里哀研究在史料和观点上基本无出其右。

《莫里哀喜剧六种》译本序在分析入选的莫里哀六个作品(《太太学堂》、《达尔杜弗》、《吝啬鬼》、《贵人迷》、《司卡班的诡计》、《逼婚》)的思想意义和人物形象之外,对莫里哀及其作品的历史意义作了更明确的论述。李健吾指出,"享有建立欧洲近代喜剧的荣誉"的,不是西班牙的维加和英国的莎士比亚,而是莫里哀。莫里哀"给欧洲喜剧作家开辟了一条宽阔可行的道路:走这条道路,就是学习他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手法,回到自己的国度和社会,写自己对题材熟悉的喜剧";"他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建立现实主义喜剧的写作和演出的传统,同时他的杰作也成为欧洲各国的喜剧作家衡量自己创作的尺度"。作为一位富有戏剧创作和舞台实践经验的戏剧家,李健吾还能够从舞台实践的角度发掘莫里哀喜剧的一些独到之处,这一点从他对北京人艺和中央戏剧学院的讲话稿中即可清楚地看出。②

---

① 李健吾:《莫里哀的喜剧》,《文学研究集刊》第 3 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195—272 页。

② 李健吾的这几篇讲话的整理稿后来以《关于莫里哀的三个喜剧作品》为题发表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学习》1979 年第 2 期。

吴达元为《欧洲文学史》撰写的莫里哀部分和他为《莫里哀喜剧选》中译本所写的序,也是当时莫里哀研究的重要成果。它全面论述了作家的时代和生平,而且按照作家的创作时序,扼要地分析了莫里哀的主要作品。文章的基本批评标准是现实主义和人民性,正是从这样两个方面,他肯定了莫里哀的成就,并因此得出结论:"说他(莫里哀)是古典主义作家,不如说他是现实主义作家更恰当"。

以上情况说明,那时的莫里哀研究深受当时文艺批评界的主流意识和苏联的影响,主要是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批评方法,以现实主义和人民性为标准,研究莫里哀作品中的反封建精神和战斗性特征。这样的研究,在发掘莫里哀作品的积极意义和社会价值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对于全面认识和研究莫里哀的文学遗产的意义和价值,却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不免会产生片面性。譬如,尽管人们都知道莫里哀是一个古典主义作家,是古典主义喜剧的奠基者,但是,为了提高作家的地位,为了肯定他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总是愿意把他往现实主义方面靠,把他的作品与那时的法国社会进行对应式的比照,说明莫里哀的作品是如何正确地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是现实主义的杰作。谈到他与古典主义的关系时,也认为他是突破古典主义的,或说他是反对古典主义的。由于特别强调莫里哀作品的战斗性,以至把作家说成反封建的斗士。如说"莫里哀是个反封建的优秀战士,凡是封建等级偏见的地方,他都反对,不管这偏见表现在门第方面还是表现在金钱方面,不管这偏见表现在社会生活上还是表现在美学思想上"(吴达元),"就整个法国 17 世纪来说,他(莫里哀)比任何一位作家都更靠近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李健吾)。

莫里哀一生艰苦、经历复杂。他长期活动在民间,了解法国社会,了解下层人民的疾苦,但并不是一个激进派,他的主要创作是在他重返巴黎,尤其是在进入宫廷、受到路易十四保护的时期完成的,因此他的思想和创作也表现出复杂性。他的创作中,既有揭露贵族的腐败、宗教的虚伪、商人的丑陋的作品,又有迎合宫廷需要的娱乐性作品,既有贴近现实、抨击时弊的内容,也有粉饰太平、阿谀君主的内容。他的思想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性质,但是,他的中庸之道,他对君主的臣服态度,就很难与"战士"的称号联系在一起。所以,研究的有待深入是显而易见的。

1966 年到 1978 年"文革"期间,外国文学的研究处于停顿状态,莫里哀的研究也不例外。

三、1979 年至 2009 年

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我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进入正常状态,中西方文化交流也变得异常频繁。此时,西方文化大量涌入,各种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纷纷传入,打破了以往那种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大一统的局面。在外国文学方面,虽然我国学术界的主要兴趣、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西方各国的现代文学,但也不忽视对西方各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许多古典作家的全集或文集相继出版,各国的文学史陆续写出,研究资料有了系统的翻译介绍。在这样良好的学术环境下,研究成果也大大超过"文革"之前。莫里哀研究的情况大体也是如此。

"文革"之后,研究莫里哀的人员大大扩展,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老中青接续的队伍。老作家李健吾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翻译和研究,完成了《莫里哀喜剧》的翻译工作。老戏剧家、南京大学教授陈瘦竹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公众的镜子——莫里哀的〈妇人学堂〉及其喜剧理论》,杭州大学教授任明耀连续几年发表莫里哀研究的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大冈对如何为莫里哀定位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 80 年代,还有一批中年学者加入莫里哀研究的队伍,如安国梁、江伙生、陈惇、奠自佳、徐克勤等。到 90 年代,有更多的人关注莫里哀。以发表过两篇以上莫里哀研究论文的作者而言,有胡健生、李韶华、唐扣兰、潘薇、汤志民、晁召行、苏永旭等。令人高兴的是,青年学者的莫里哀研究更具有开拓性。至于 1979 年以来发表过莫里哀研究单篇论文的作者,则不下于百人,其中多数是大学教师,也有文学理论和美学方面的学者。

1979 年以来,莫里哀作品的翻译和出版有了很大的进展,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再版赵少

侯等译的《莫里哀喜剧选》外,最重要的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李健吾翻译的四卷集《莫里哀喜剧》(1990—1994)。这部集子包括莫里哀的27个主要作品,前面不但有李先生为译本新写的序,而且附有一些重要的研究资料,如《1682年版莫里哀作品集原序》①,有莫里哀年谱,还有17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评价莫里哀及其喜剧的语录。这是目前我国出版的、最好的莫里哀作品的译本。另外,1999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肖熹光翻译的《莫里哀戏剧全集》,包括37个剧本,补足了以前译本所缺。

1983年,陈惇撰写的《莫里哀和他的喜剧》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最早出现的一本全面评介莫里哀及其作品的著作。该书篇幅不大(共67000字),却全面论述了作家的生平和创作,在某些重要问题(如莫里哀与专制王权的关系等)和几部重要作品(《太太学堂》、《达尔杜弗》、《吝啬鬼》、《贵人迷》等)上,进行较为深入的论述。当然,它并未脱离当时评论界一般状况,只是对作家和作品进行社会、历史的分析,未能有所突破。1986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法国学者皮埃尔·加克索特写的《莫里哀传》(朱延生译)。加克索特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考证了有关莫里哀的史料,纠正了许多谬误的传闻,写成了这本具有权威性的传记。以上这些选集、全集和传记的出版,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作家,进一步推动了研究的进展。

1979年以来,报刊上每年都有莫里哀研究和有关莫里哀的文章发表,少则一两篇,多则十来篇。据不完全统计,除了书序、教材、文学史和文集所收的有关莫里哀的研究成果之外,单是报刊上发表的这类文章,有160多篇(不包括有关舞台演出的20多篇评论),盛况空前。它是新中国成立之前二三十年间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莫里哀文章的11倍,是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的16倍。这些文章大都继续老一代学者的传统,采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着重研究莫里哀作品与17世纪法国的关系,研究莫里哀作品中的人物和思想的社会意义。不过,近年来有所改变,不少文章把研究重点放在莫里哀的喜剧手法和风格特征上,研究方法也有所改变,如采用女性主义方法和弗洛伊德的、米勒的理论来研究莫里哀作品。这样的文章为数不多,然而,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研究莫里哀的,却大有人在。

这些评介文章大致可以分为五类:一是莫里哀喜剧作品评析,二是论莫里哀的喜剧艺术,三是莫里哀喜剧观研究,四是莫里哀比较研究,五是关于莫里哀的争议。其中,莫里哀喜剧作品分析一类的文章数量最多,分析的作品又集中在《达尔杜弗》和《吝啬鬼》两部。文章的内容多半是分析作品的人物和思想、辨析其社会意义,也有的论者把视角投向作品的艺术性。80年代后期,后一种论著多了起来,与此同时,论者的眼界呈现出多元化趋势,或开辟一些新的层面,或引申其深层意义,如鲁萌的《论达尔杜弗》从美学理论的角度来探讨达尔杜弗为什么拥有长久而普遍的审美价值的问题,唐扣兰的《隐形的遥契:〈西厢记〉与〈伪君子〉的叙事话语》运用符号学理论比较分析作品,别有新意。受到中国学者关心的莫里哀作品,除了以上提到的两部之外,还有《愤世嫉俗》、《贵人迷》、《太太学堂》、《逼婚》、《乔治·当丹》和《凡尔赛宫即兴》(以发表评论的数量为序)。由此可见,备受中国评论界关注的是莫里哀喜剧中那些社会讽刺意义较强的作品。

莫里哀的作品为喜剧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李健吾等老一辈学者的论文中,对此已经有所总结。近年来,有论者对莫里哀喜剧的讽刺艺术和闹剧手法产生了兴趣,如胡健生多次发表论文探讨莫里哀喜剧的讽刺艺术。他认为,讽刺是莫里哀为自己找到的一种反映现实、干预生活的最佳武器,又根据对象的不同而表现出三种形态:纯讽刺手法,温和的讽刺——幽默,轻松的讽刺——滑稽。他还特别强调闹剧手法在莫里哀喜剧中的作用,甚至用"闹剧化"这样的词语来概括莫里哀喜剧的特征。还有的论者从戏剧史的角度说明莫

① 此文由法国莫里哀剧团的演员拉·格朗吉和莫里哀的知心朋友维诺所写,历来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莫里哀传记材料。

里哀对世界喜剧发展的意义,如李韶华的《莫里哀喜剧创作与西方戏剧叙事范型的转换》,韩晓清的《塑造现实世界的"人"》。

莫里哀不仅有丰富的创作经验,而且对喜剧有独特的理解,他虽然没有写过这方面的专论,但他的《〈太太学堂〉的批评》和《凡尔赛宫即兴》实际是两篇戏剧化的理论著作,另外,他在为自己的一些剧作所写的序言和信件中,都表现了他在论战中生发出来的、闪光的真知灼见。李健吾在他的《莫里哀的喜剧》一文中已经谈到这一点,后来还曾专门选出一些莫里哀对喜剧艺术的论述,发表在《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上。1978 年以后,陈瘦竹、任明耀两位老教授率先在这方面进行专题研究,初步对莫里哀的喜剧观作了整理。紧接着,陈兆荣的《略论莫里哀的喜剧观念》就莫里哀的几篇重要理论性的作品进行分析。这些论著都强调了莫里哀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安国梁的《莫里哀喜剧艺术理论初探》以"反叛"、"开创"、"自然"为题,从三个方面对莫里哀的喜剧观进行系统论述,特别是"自然"一节更提出莫里哀喜剧观的理论基础,把问题引申一步。吴邦文的《论莫里哀创作的美学原则》把莫里哀喜剧观的几个重要论点和他的创作实践结合起来分析,更看出莫里哀喜剧理论对后世的价值。

早在 1949 年前,我国就有学者对莫里哀进行比较研究。1978 年以后,当比较文学在中国迅猛发展的时候,对莫里哀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也多了起来。这些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品的比较研究,把莫里哀作品中的人物与中外作品中的同类人物(伪善者、骗子、吝啬鬼、女仆)进行比较,辨析其异同,探讨其成因。

另一类是莫里哀与他国文学、他国作家的比较研究。有的从影响研究的角度,论述莫里哀对古希腊罗马和西班牙文学的接受,以及他与 18、19 世纪欧洲喜剧的关系。苏永旭的《"骗子"本生与莫里哀的〈伪君子〉》还提出剧本可能间接受到印度文学影响的假设。这方面的文章并不多。影响研究的另一个角度是研究莫里哀与中国的关系,评论中国学者的莫里哀研究,如陈励的《莫里哀与中国》、韩益睿的《二十年来中国莫里哀研究现状初探》、王德禄的《评李健吾对莫里哀喜剧的研究》。

在后一类文章中,平行研究的文章,尤其是在莫里哀与莎士比亚之间,莫里哀与李渔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居多。一般都从作家对戏剧的执著追求、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以及悲喜剧因素的结合等方面来比较莫里哀与莎士比亚的相似,又从选材、人物塑造、情节结构等方面比较他们作品的不同。如苏永旭、赵晓玲在《莎士比亚与莫里哀典型观的三个区别》中提出莎士比亚塑造的人物是丰富复杂的、高度个性化的和发展变化的,而莫里哀塑造的人物是性格单一的、高度类型化的、凝固不变的,一个靠的是复杂的单纯,一个靠的是单纯的复杂,表面上南辕北辙,实际上异曲同工。李鸿泉在《莎士比亚与莫里哀戏剧艺术比较》一文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悲剧与喜剧处置角色的要求是不同的,因此笼统地把莫里哀的喜剧人物与莎士比亚的悲剧人物相比较是不合适的,由此而褒莎抑莫更不恰当。晁召行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从美学思想的角度对两位作家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莎士比亚从"美在和谐"的思想出发,直接以生活中的和谐与完美作为观照审美的对象,他的喜剧以情感人,给观众留下的是对美的肯定和回味。莫里哀则以社会与人的精神上的肿瘤为观照审美的对象,他的喜剧是对畸形的社会现象和人性的喜剧性刻画,在笑声中留给观众的是对现实和自身的沉思和反省,进而在生活中尽力避免和纠正它们。

在莫里哀与中国的平行研究中,较多论者把目光投向了李渔。潘薇连续发表了三篇长文,比较详细地阐述了这两位喜剧作家的异同及其成因。他着重分析了中西两方喜剧传统的不同风格和审美文化心理的差别对作家的影响。他认为,莫里哀的喜剧继承并发扬了西方喜剧的讽刺传统,找到了传统审美文化与当代社会现实的契合点,创造出众多别开生面的讽刺喜剧;与西方喜剧相比,肯定性喜剧或歌颂性喜剧的发达,是中国古典喜剧的鲜明特征,乐而不淫、中庸平和又是传统的审美文化心理,李渔的喜剧正是这种传统的延续,是戏曲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除了在莫里哀与李渔之间进行比较研究外,也有论者在莫里哀与关汉卿之间进行比较,在莫里哀与明代的

拟话本小说之间进行跨文体的比较。

莫里哀作为一个古典作家,他的历史地位和杰出贡献是无可争议的,但是评论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还是有着不同的看法。

第一,莫里哀是反封建的战士还是表现路易十四时代主流意识的戏剧家?

这方面的文章虽然不多,但在如何重新认识莫里哀,以及如何科学地评价作家方面,给人以新的启示。如前所说,1949年以来的莫里哀评论一般都突出其战斗性的一面,强调他的作品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精神。按照这样的理解,所谓"莫里哀式"的喜剧就是那种以讽刺为武器进行犀利的社会批判的喜剧。在这样的评价中,莫里哀仿佛高高站在社会之上,揭露其弊端,批判其人物,俨然是一个"反封建的战士"。近来有人对这样的评价提出了异议。最直接、最明确地提出问题的是麻文琦的《"莫里哀式"喜剧辨析》。该文认为,莫里哀式的戏剧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它显示着创作的多种方向,既有社会讽刺性的作品,也有娱乐性的作品;莫里哀并不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莫里哀的价值观是与路易王朝时期主流的价值观相符合的……莫里哀的讽刺艺术浸透了古典主义精神,这是一种在确保政治正确的前提下的讽刺艺术"①。

究竟应当如何全面认识和评价莫里哀?如何看待莫里哀作品中的批判精神?如何恰当地评价他的作品?有意无意地拔高或贬低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不可能得出恰当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广林提出重新辨析"莫里哀式喜剧",实际是要把莫里哀放回到他那个时代给以历史主义的、全面的评价,表现了一种新的科学认识和评价莫里哀的态度。

第二,莫里哀是古典主义作家还是现实主义作家?

在1979年以前的评论中,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但并不明朗。李健吾、吴达元在文章中都愿意把莫里哀说成是现实主义作家,但都没有明确地把他从古典主义作家的阵营中分离出来。因此这个问题是含糊不清的。1984年,胡承伟在《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9辑上发表《论莫里哀的创作思想》一文,从作家的政治态度和作品的思想倾向上,尤其从作家的文艺思想上,说明莫里哀与其他古典主义作家不同,是一个"自觉的现实主义大师"。如果说这篇文章还没有割断莫里哀与古典主义的瓜葛,那么两年后,罗大冈明确提出:"莫里哀的喜剧不属于古典派",而是"法国文学史上为期最早、成就极大、影响深远的现实主义作家、艺术家";"在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史上,其重要性不亚于巴尔扎克"。② 问题提得相当尖锐了。事隔10年,同一家刊物发表吴晶的《古典主义和莫里哀》③,专门论证莫里哀的作品是古典主义的典范,似乎是回应罗大冈的,但并没有展开正面争论。在此前后,不少评论文里,两种提法混用,不加区别。实际上,其间存在着某些理论上的混乱。首先,这样的观点显然受到当时那种唯现实主义独尊的文学史观的影响。胡承伟在文章中说:"唯有现实主义的作品才有真正的生命力",抱着这样的偏见,他几乎否定古典主义的存在,把古典主义中有价值的东西分离出来,归功于现实主义,以至混淆了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界线,硬把古典主义作家往现实主义的方面靠。其实,在17世纪,并不存在作为文艺思潮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把古典主义思潮中出现的作家说成是现实主义作家,勉强把思潮和创作方法这两个概念混在一起使用,文章就出现混乱。再说,古典主义虽然是一种思潮,但在这个思潮影响下进行创作的作家并不是一个统一体(其实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许多文艺思潮都具有这样的情况),在许多共同点之外,他们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并不完全一致。莫里哀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外省,在艺术上又熟悉民间戏剧的喜剧作家,作品中自然具有更多的民主倾向而自成一家,然而他的创作确实是

① 该文精要发表在2006年4月9日的《中华读书报》上,署名为广林,后来又扩充为一篇论文,发表于《戏剧文学》2007年第7期。

② 罗大冈:《现实主义戏剧家莫里哀》,《外国文学研究》1985年第3期,第5—7页。

③ 吴晶:《古典主义和莫里哀的喜剧创作》,《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第53—58页。

接受了古典主义原则的,我们没有必要把他从古典主义的阵营中划分出去。他的功劳也恰恰在于为古典主义喜剧创造了典范。有的论者写文专论莫里哀对古典主义的突破(如孔耕藇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84 年第 1 期上的《论莫里哀对古典主义的突破》),其目的也在说明莫里哀是现实主义作家。但是突破也就是突破,是在遵守基础上的突破,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与古典主义的基本联系。

第三,如何认识莫里哀喜剧中的悲剧性成分?

歌德在与其秘书埃克曼的谈话中常常推崇莫里哀,而且提出一个相当深刻的意见:莫里哀的喜剧具有悲剧性特征。这个意见后来为众多评论家接受。我国二三十年代的莫里哀研究者,如焦菊隐等人,也往往把这一点作为作家对喜剧艺术的一大贡献而着重论述。后来,许多莫里哀作品的分析评论文中也常常提到这一看法。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更有专门论述这一内容的文章发表,如唐扣兰、张加嘉的《新论莫里哀喜剧的悲剧色彩》,陈静、余彦燕的《笑里藏刀:莫里哀喜剧作品中的悲感因素》。这些文章认为,莫里哀的喜剧是以笑的方式写出了人在严峻的生存困境里和在现实的不可超越面前的无奈和悲哀,使得这些喜剧形成了悲剧性的审美效果。王骁勇在《透过〈堂吉诃德〉看〈悭吝人〉——莫里哀喜剧人物悲剧化手法探源》一文中说,莫里哀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风气,通过形式上的荒诞表现可悲可叹的实质。

但是,有学者对此发表了不同看法。胡健生多次发表论文称这是"莫里哀研究中的一个理论盲点"。他说,虽然莫里哀也看到生活中悲剧性的一面,但是,作为一个高明的戏剧家,他总是通过人物性格的巧妙处理——着意渲染突出人物身上构成喜剧性矛盾的性格表现,最大限度地抑制悲剧性线索的发展,尽量淡化、消解悲剧性因素,使之深藏于喜剧帷幕的背后,因此,他的喜剧也以不含苦涩悲哀色调的欢快流畅的笑为其显著风格特征。①

在这些有关莫里哀喜剧风格的不同意见中,有的说是有"悲剧因素",有的说是有"悲感因素",有的说是有"悲剧色彩",有的说是有"悲剧意蕴",提法的不同说明论者对莫里哀喜剧中所包含的悲剧性成分的掂量和估计并不相同。胡健生的文章起先就莫里哀是否有意在剧中掺入悲剧因素展开争论,似乎并不否定歌德的提法,后来则根本否定其悲剧成分,态度前后有差别。看来,究竟如何认识莫里哀喜剧的风格,还是一个需要认真研讨的问题。

第四,如何认识莫里哀笔下的所谓"扁形人物"?

莫里哀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成功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也有的论者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引用普希金的话,说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的性格是复杂多面的,莫里哀的人物性格是单一的,多少有一点褒莎贬莫的意味。这实际是现实主义独尊的理论在人物塑造问题上的表现。在 80 年代的中国理论界,有过一次关于所谓"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孰优孰劣的讨论。这次讨论虽然不以莫里哀为专题,但也涉及对莫里哀人物塑造的评价,引起研究者对莫里哀人物的价值及其取得成功的原因进行深入思考。讨论主要围绕着达尔杜弗和阿尔巴贡这两个人物而展开。论者一般并不否定这两个人物而探讨莫里哀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如说莫里哀紧紧抓住了人世间存在的各种虚伪现象加以概括和夸张,使达尔杜弗成了一个以虚伪为本质特征的具有永久艺术魅力的艺术典型。所以,所谓扁形人物的写作方法不能一概否定。阮航的《谈谈扁形人物答尔杜弗》对扁形人物多有贬词,但认为莫里哀对达尔杜弗的塑造是成功的,因为他不是采用取同类人物平均值的方法,而是将某一性格夸大化以塑造人物,不但写出人物可能这样做,还写出人物必然这样做,于是,尽管达尔杜弗是扁形人物却仍然具有审美价值。邓楠在《论"扁平人物"阿尔巴贡》一文中认为,阿尔巴贡虽然属于扁形人物,但不是简单化人物,也不是概念化人物,而是典型人物,是黑格尔所说的"独特的这一

① 胡健生:《莫里哀喜剧艺术风格:悲喜交错乎?——试论莫里哀研究中的一个理论盲点》,《国外社会科学》1998 年第 3 期,第 47—50 页。

个”。周莽的《并不遥远的呼应——论中外古典戏剧中的“扁平人物”》从历史的角度论证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并无优劣之分,类型化的扁平人物具有自己的长处,莫里哀的阿尔巴贡具有世界意义。

四、结　　语

莫里哀的作品是法国人民的宝贵遗产,也是世界人民的宝贵遗产。作为一个喜剧作家,他留下了堪称经典的作品,任何一个想要在喜剧领域里有所作为的人,都应该拜他为师。我国的戏剧界和文学界历来珍惜这份遗产,在这方面做过大量工作。但是,作为一种历史遗产,它必然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局限,因此如何认识和接受其中的精华,如何分辨其中的局限,是一件需要谨慎对待的复杂工作。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还受到一些传统的思维定式的限制,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今后,我们需要解放思想,摆脱成见,继续探讨它们的历史价值,努力吸取其中对我们今天有用的东西,以便更好地接受这份遗产,让它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肥田沃土。

60年来,已经发表的莫里哀研究的论著不算少,但是,真正有创意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而且至今没有出版一部有分量的研究专著;除了李健吾外,没有出现一位研究莫里哀的专家。这些都说明我们在这位世界著名的作家身上所下的工夫还不够。还有,研究方法单一,对象过于集中(主要是集中在几部社会批评性较强的作品),重复研究的现象比较突出。再有,我们在莫里哀研究中已经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诸如他的喜剧理论、他的喜剧性格塑造的经验、喜剧性与悲剧性的处理、喜剧效果的营造和讽刺艺术等,但是,理论准备不足,解决问题的力度不够,提出的问题未能展开充分讨论。这些都是妨碍我们的莫里哀研究取得根本性突破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出现的多角度多元化的评论趋势,应该说是有利于打破已有的思维定式,有利于解放思想,打开思路,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作家及其作品的,虽然这仅仅是开始。

A Review and Analysis of Molière Studie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60 Years

Chen Du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Molière is one of the first batch of Western classical playwrights introduced to modern China and most welcomed by Chinese readers. Before 1978, social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 played a dominant role in China's study of Molière, laying great emphasis o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values of his works and his fighting spirit. Since 1978, Molière studies have made fruitful achievements but still shown a lack of originality and inadequacy of creativity and variety. On the whole, the study of Molière focuse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Was Molière an anti-feudal fighter or a mainstream dramatist during the reign of Louis XIV? Was he a classical or realist playwright? How do we appreciate the tragic factors in his comedies? How do we analyze the so-called "flat characters" in his plays? Notably, a pluralism of critical methods has become discernible in recent studies,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our further research on Molière.

Key words: Molière, drama study, critical review

(责任编辑　何　方)